

在鄉村社區發展過程中， 傳統宗教的角色與功能

許雅惠

《本文摘要》

作者從政策擴散(diffusion)理論的角度，回溯台灣地區社區發展政策的歷史結構背景，分析當前社區發展工作實務上的困滯與癥結；而從宗教功能與社會福利的親和關係與臺灣地區傳統宗教的社區經驗中，建構社區發展的本土化基礎。在研究的實証資料上呈現臺灣鄉村社區中，傳統的宗教寺廟資源參與發展過程的角色與功能，並探討影響寺廟參與社區發展工作的相關因素：直接影響因素是社區組織（社區發展協會或社區理事會）與寺廟資源的互動與整合；間接影響因素則是社區中寺廟資源之有無與寺廟是否捐款給社區二項。此外，雖然有75.2%的受訪社區會運用傳統宗教資源，但在運用的程度和方式上都顯得被動、偶發、零散而片斷。而社區與寺廟的主事者對寺廟資源的認知，則與寺廟參與社區發展有高度相關，並有互為因果的可能。

壹、社區發展的困境與本土化

幾乎所有的社區發展或社區組織的理論都在強調居民參與、社區自主自發的重要性，但在臺灣的社區發展卻始終停留在「政府支援、外大主導」的模式

中。二十多年來，政府的金錢投入、技術援助和人力動員的成本所換得的是今日社區過度依賴政府，發展成效不彰，社政人員士氣低落，人民參與不足、社區組織不健全和社區組織轉型困難的代價。

在討論社區發展的文獻中，Nanavaty (1988: 94)曾分析聯合國在一九五一年經社理事會的「三九〇〇議案」，企以工業先進國家為傳播的媒介，將戰前許多國家原已推行之民衆教育、農業推廣、合作事業、鄉村建設（尤以中國大陸在民國十年至二十年代所興起的平民教育與鄉村建設運動最受重視）擴大合併成「社區發展方案」推廣至世界各國。聯合國大量地提供知識、經費、技術及人力資源；其所聘請之專家、學者廣泛地在西歐、北歐、亞洲、非洲及拉丁美洲舉辦無數的研討和說明、經驗交流會議；源源不斷地產生示範和擴散的效果。擴散的事實不僅見諸史冊，也符合 Collier & Messick (1975)所指出的；擴散模式屬於「層級擴散」，發生在不同社經發展程度的國家之間。

聯合國透過中美英蘇等國的殖民系統向外推動社區發展工作的影響深遠，許多戰後亟待復興的國家因此得到重生的契機。但在「創新、移植」的過程中，不論是採借科技、政策或一門專業，都需要有本土化的選擇、採借能力，否則採借的成果必將淪為工具化或一種型式上的空洞。在臺灣，社區發展的歷史與政策制定的過程都處處可見聯合國的影響証據，卻少有從「擴散—採借」的角度去討論社區發展的本質和困境發生的癥結所在。作者曾仔細地回溯當時的

歷史背景，從「擴散理論」的觀點出發並強調社區發展的本土化過程。（許雅惠，1994）。

在一九七〇至一九八〇年代二十年間是社區發展在臺灣最輝煌的顯學時期。「社區發展」一詞首現於「民生主義現階段社會政策」之中，而在當時由「政治菁英意識型態」決定一切的政治生態中，社區政策及其他的社會政策都只是反應「三民主義建設臺灣為復興基地，穩定社會，號召人心反共」理念下的副產品。其實以當年臺灣在世界經濟體系中、對外國國際關係上及對國內社會滲透的力量、國家官僚制度方面的條件，採借國際間值得學習借鏡的政策並無可厚非，短期上看也甚有助益。這段由聯合國支援經費與專家技術，再以當時「民生基層建設」為參考藍本的歷史，是社區發展學者最津津樂道的經驗。然而，前文強調，採借創新應該是有條件性的選擇並有計畫地累積實務執行經驗以找出適合本土需求的方向。可惜者，在長期的政策主導和強立動員下，臺灣的社區不僅缺乏足夠的資源以自助自立，也缺乏經驗以學習，甚至缺乏創新的精神和轉型發展的勇氣。社區發展的本土化，至今仍是一條漫長的路。

社區發展工作目前面臨瓶頸於四方面，（一）政府決策的困境。在社區發展推動的初期，地方政府為求立竿見影之效，多大力推動以「基礎工程」為主的有形建設，在改善鄉村道路水溝等公共建設、家戶整潔與環境衛生方面良有成效；但長期在此「技術援助」模式的發展下，社區組織自主空間已然受限，社區居民參與決策的機會微乎其微！此種由政府補助，社區配合的工作模式雖接近於理論上所指涉之「技術支援模式」或「指導變遷模式」，然因政府除了補助高比例社區經費外，也提供工作參考項目，而社區理事會於選定工作項目或申請某種計畫方案補助時，仍須由政府核准其工作方案。故實質上，有所受補助之社區必然須接受政府之指導與考核。（徐雲，1991：13）例如，以民國七十九年至八十年間，政府補助社區的經費與社區配合款相較而言，則政府之補助金額高達全部社區經費的79.0%（內政部統計處，1993a：50）

「社區發展」到底是行政工作項目？還是民主和民治的過程與方法？若是前者，則政府應給予法律的依據及行政推動的工具；若為後者，則政府應給予社區更大的自主空間，並擴大社區的定義，解去其長期行政上的箝制。不宜思以行政方法推動工作，又不給予適當的推動工具；認為是人民自助的事業，又不給予自主的空間。（汲宇荷，1990：62）若言社區發展是為達成民生主義理想之綜合建設，則就行政部門協調來看，行政單位的各項發展計畫，多屬單軌推動，交通的歸交通，環保的歸環保，未能相互配合，各行其是的現象，似難達成政策始初的理想。（徐雲，1993）綜而言之，中央決策必須在根本上解決社區發展的定位問題，方能擬定適當的對策來解決政府角色曖昧矛盾，民間無以適從的困境。

（二）社區工作人員的專業期待與角色扮演上的困難，是社區工作轉型困難的大關鍵。根據相關研究指出，基層的社區工作人員有88%對社區工作有挫敗感，70%感到力不從心，而工作者的倦怠——滿足感與政府政策的認同和機構的關係有高度相關。其次，工作人員對本身專業角色的期待和理事會、地方政府之期待有明顯不同。理事會期待社工員扮演事務員、幕僚，甚至社區的決策者、規畫者和執行者。而社區理事只須作消極的參與如開會等。政府（如區公所）則希望工作人員扮演主動角色全力投入，協助社區理事會處理各項事務，成為推動、執行的主角，而非區公所。而相對的，社區工作人員卻認為自己的角色應為「過程取向」的專業身分。

51%的答卷社區工作人員對社區工作沒有正向的看法」直接地說，社區工作員面對的是理論不能指導實務經驗，而實務經驗又不能印証理論的教育窘境；面對的是決策立意不明而實施情境曖昧的專業尷尬。社區工作人員的士氣如此低落，很難期待專業力量能有所發揮。

（三）在社區組織結構與運作上，社區理事會組織不健全、社區理事會不清楚本身的角色與功能、缺乏合作意願等是社區工作推行上的重大障礙。社區範圍

既以村里為基礎、而社區組織又以村里長及鄰長為骨幹，社區理事會之總幹事多以村里幹事兼任，造成基層行政單位與社區的高度重疊；社區工作與里鄰功能混淆不清；社區權力代表和意見核心均不足以代表民間社會的決策力量；居民參與不足直接挑戰了理事會在組織、運作上的合法地位等諸多問題。

（四）人民參與的困境方面社區發展兩要素，「錢」與「人」，缺一不可。在社區發展運作過程中，人力資源是最重要的原動力。從人類如何和環境搏鬥到社區如何為居民所模塑，都需要人們的關心、參與和投入。尤其是社區發展此類強調共同決策之自主性、自發性行動，居民的普遍參與，凝聚共識，民主決策，開發資源以至滿足共同需求，整體評估等，都是社區工作的精髓；離開了人民的參與，社區發展就只是一個冰冷的實驗。

檢視社區發展的相關研究發現，不論是官方的統計資料或委託學界所進行的研究報告，都少有測量社區工作的參與程度或看法。關心社區發展的研究者很難從現有的量化數據看社區發展在基層社會中的真實面貌。究竟社區工作內容是否與民衆的基本需求相應？是否根植於社區基盤？正如社區行動的實務者所言，任何沒有人民參與的方案或發展計畫，都是徒勞而無功的。

貳、本土化的力量：宗教寺廟資源的參與

不論中外，社區都是宗教提供社會福利最早的據點。從「愛你的鄰人」到「無緣大慈、同體大悲」，宗教的力量不分疆域，無遠弗屆。西方的社會福利出自教會，東方的民間慈善源於寺院，雖殊途但同歸。從宗教的社會功能、中西民間社會福利力量的支撐，到臺灣鄉村社區中傳統宗教變遷的討論，都顯示寺廟在社區基盤結構中佔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有學者指出，社區發展之不能落實，即在於缺乏寺廟系統的支持（黃維憲，1990）。

在都市化的衝擊下，鄉村已逐漸失去用地地理特徵作為認同社區的標誌；宗教活動變成是少數能與社區結構、居民認同相容，並促進社區合作團結，使村民繼續認同社區為一具體存在的機會。即便在都市社區，寺廟也提供社區整合的功能，不僅增進居民對社區的認同情感，也產生組織與整合的力量。（鄭興弟，1987：71-72）此亦是民間宗教（道教）在社會公益慈善活動中較少針對個人層面問題而設計，而比其他宗教更注重社區性公共利益發展的原因之一。

根據資料，宗教團體辦理的各項公益慈善活動一年支出金額約為一、六九百萬元，其中道教占44.5%，佛教占35.53%，合計已接近80%，可見傳統宗教資源之龐大，然而在服務項目方面，卻不如西方宗教之有系統和專業化。在各項慈善活動中，協助社區建設捐助經費者以道教為最多，顯示道教與社區的關係較其他宗教更親密，對社區發展工作比其他宗教更有興趣和經驗。（內政部統計處，1993）

不論是村廟，街鎮或城市的大廟，甚至是信徒範圍廣大的名廟、觀光廟，都有其各自所屬的地方社區，也就是廟宇主神所轄得基本範圍。只要是公廟，與地方社區就有密切的連帶，居民之祭祀的、社會的、心理的、娛樂的需求都在這裡得到滿足；居民與社區之歷史的、心理的連帶，也藉著村廟的活動而建立起來。林美蓉（1993：162-164）研究寺廟與村里重合的結果指出，村廟是地方公眾事物的中心，除了作為公眾祭祀的場所之外，亦會在廟內討論與地方社區有關的事務。往昔村廟即是所謂的公廳或集會所，現在很多村廟和里民集會所或社區活動中心和設一處，甚至有些村廟設有圖書館、托兒所或幼稚園，農事小組或水利會有時也在廟內開會。村廟旁常有大樹，是夏日納涼、聊天、娛樂的公共場所，現在很多村廟內或廟旁常有長春俱樂部活動的場所，特別是男性老人，喜歡在廟裡聚集、喝茶、下棋、開講。

因此，本研究根據文獻與統計資料的整理，主張社區發展在現階段的目標，應重視民間力量的開發與參與；在由官方主導的模式轉移成民間經營的過程

中，宗教資源在社區體系中的角色舉足輕重。蓋因宗教資源不僅與居民生活緊密相關，更是社區意識凝聚之所繫。若能促使社區工作重視宗教寺廟資源，則未來的社區發展本土化將更有希望。

參、研究架構與研究方法

本研究為探索性研究，意欲了解在鄉村社區中，運用寺廟資源的方式與程度，寺廟資源在社區中的功能與角色，並希冀能找到互利二者的合作模式與影響因素。本研究的架構如圖一。

研究方法以問卷調查法為主，並在資料統計分析後，進行對社區、寺廟主事者的重點訪問，以蒐集補充量化資料之不足。

研究範圍則以台北、宜蘭、彰化與台南四縣之鄉村社區與寺廟為對象，依系統抽樣法抽取46份樣本寄發研究問卷。經二次催收工作後，共計回收116份有效問卷，有16個社區與6所寺廟回填受訪。

在資料分析策略上，以百分比分配，卡方檢定，控制變數卡方檢定與對數線性模型等統計方法為主，輔以訪談內容加以解釋分析。

肆、資料分析與解釋

一、寺廟參與社區發展的途徑與模式

研究結果顯示，目前臺灣地區鄉村社區運用寺廟資源的比例是75.2%，也就是有四分之三的鄉村社區曾經運用社區中的寺廟資源進行社區發展工作（此處所指寺廟，包括村廟以外者）。寺廟參與社區的方式經常性的如(1)提供場所作社區辦公室，(2)捐獻土地建設社區活動中心；其他非經常性的參與

則透過(1)發動信徒參與或提供人力協助，(2)出借場地器材供社區使用，(3)協助規畫、準備社區活動，(4)捐獻金錢，(5)幫忙宣傳、廣告等途徑。詳如表一。

以研究結果和文獻所得的一致性發現是，寺廟參與社區發展的方式和程度明顯有被動、消極、選擇性和偶發性等特性。換句話說，雖有高比例的寺廟曾經參與社區工作，卻不一定有足夠的經驗保證。

社區與寺廟要合作基本上以經常連絡為必要條件。合作關係則以「互相支援，一起工作，不分社區主導或寺廟主導」為最多也最受認同。更深入分析則發現，社區中必有一公建之村廟，而村廟比其他寺廟更適合參與目前社區發展的工作內容，因為其他寺廟的組織因素和活動情形不如村廟與社區的關係密切。

村廟參與社區最好的模式是「社區精英」（地方上稱為「頭人」）同時擔任社區理事與寺廟的管理委員，這些精英熟悉社區的一切事務，不論是那方開會或活動，均可真正掌握資源調度和動員的能力。同時，邀請廟方參與的取好方法是「請他們參加開會，一起商議」。

二、影響寺廟參與社區的因素

本研究假設，影響寺廟參與社區的因素有兩類，一是環境因素，一是認知因素。茲將假設驗證結果說明如下：

1. 直接影響社區運用寺廟資源的社區環境因素是：「寺廟代表擔任社區理事」和「社區與寺廟的經常連絡」。間接影響的環境因素則是「社區中有寺廟」和「寺廟有捐款給社區」。其他社區特質並不影響。詳如表二。

2. 寺廟是否參與社區只在「不同的寺廟信徒人數」上有差異，其他寺廟特質都沒有顯著差異。

3. 寺廟是否參與社區和寺廟主事者、社區理事長「資源認知態度」有密切相關，也有互為因果的可能。資源認知包括「寺廟資源的支持度」、「宗教

人的社會關懷」和「寺廟資源的特殊性」。對寺廟資源參與社區的認知態度愈正向，其寺廟參與社區的比例也愈高；反之亦然。

4. 寺廟資源確實比社區中其他資源更具有特殊性：1. 人力資源更傾向社會關懷和利他性，2. 物力源更具機動性和方便性，3. 財力資源更具穩定性和社區自助意義，4. 寺廟提供的服務更適合老人活動和休閒的需求。

5. 鼓勵寺廟參與社區的政策最受寺廟歡迎的是「減免稅捐」，雖然寺廟在某些稅制上已經有特殊規定或減免辦法，但仍有某些稅目是沒有優惠的。顯示目前的獎勵方式可以再多元而具體些。詳如表三。

三、社區的軸心：村廟與其他寺廟的比較

臺灣社會的傳統宗教派別十分複雜而歧異。除了道教和民間信仰這一幾乎重合又難以分辨的宗教外（本研究中大致將道教與民間信仰視為一），另一擁有龐大資源且深具號召動員力量的宗教則是佛教。但在鄉村社區中，佛教寺院的數量和對地方社區的滲透力皆不如民間信仰的廟宇大，此是因為佛教只有信仰圈而沒有祭祀圈。在參與社區發展的空間上，佛教寺院所能提供的資源顯然不適合目前的社區發展內容，而較適合針對特定需求人口所設計的服務方案或特殊性高的社會計畫。在服務區域上，也不宜自限於寺院鄰近，因為不論是社會資源的累積資本或動員能力，佛教慈悲普渡精神所散發的力量都是村廟所不能比擬的。

相對的，臺灣的鄉村，村廟的分布均衡且密集度高，有庄頭就有村廟，有村廟就有祭祀，有祭祀就有共同意識。社區工作發展在村廟有形的人力、財力、物力和無形的號召力配合下，顯得自發、自然和自強。

四、村廟的四種角色

村廟在社區發展中扮演四種角色：一是「意識凝聚者」，二是「資源提供

者」，三是「價值倡導者」，四是「文化傳承者」。

首先，村廟在社區中屹立久遠，其成形於地方安居樂業的需求，不論是安土重遷或是落葉歸根的思想，社區居民共同意識都起於宗教繫於村廟，拜相同的保護神，有相同的祭祀活動。村廟的存在使社區有了具體的象徵，而這象徵不僅在地理上是居民日常聚會的中心，也是居民在危難疾苦時最大的精神依靠。臺灣社會的基層結構在此，相同的需要和生命經驗在這裡交流，相同的意識也在這裡凝聚。

其次，村廟是社區資源的提供者。村廟的人力資源多是虔誠的當地信徒，其具有社會關懷、樂於助人和有愛心的形象；村廟的財力資源多來自社區的信眾或離鄉的出外人口奉獻的香火，村廟的經濟聚集透過社區發展工作的推動，又移轉成具財富再分配功能的社會支出。村廟的不動產、土地捐獻位於社區中心，是最佳的社區活動中心建地；而村廟的器材場地機動性高，租借方便，為物力資源之最。

再者，宗教教忠教孝，勸世濟人的精神，止惡揚善因果天理的訓示，是價值的維護者；而有些村廟自行籌措經費或形成組織，以行動去實踐宗教的精神，更是價值的倡導者。

第四，寺廟是社區文化傳承的機構，其本身的歷史是一種珍貴的社區遺產，其宗教儀式和活動所傳遞的是一種文化的脈動。社區發展的經驗由基礎工程建設演進到今日的精神倫理建設，其目的在使社區透過有意義且具地方特殊文化的活動，來提昇人文發展和生活品質；也能在現代需求滿足的同時，為後代紮下文化倫理的深根。促進社區和寺廟的合作變成了達到多重目的之唯一途徑。

「存在的意義在於發揮功能」，這是功能論者最大的堅持。寺廟在鄉村社區中多面向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功能，隨著時代腳步也不斷地在調整。大部分人從出生到死亡都不曾離開過宗教的浸潤；人們在宗教中學會感恩謝天

，學會樂善好施，學會慈悲普渡。而「社區發展」是小規模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縮影，也是公民訓練的最佳場域。走出家庭就是社區，人們在社區中學會關心公眾事務，學會民主自決，學會團結共榮。在本土化的配適過程中，寺廟所提供的將是多重的角色與功能。

伍、研究相關建議

一、對社區發展政策的四項建議

當八十年五月「社區發展工作綱要」規定臺灣地區四千多個社區理事會在任期屆滿者得改組為以人民團體形態運作的「社區發展協會」，自由召募會員，收取會費，選舉理監事後，社區發展其實已經有了不同以往的體質。在鄉鎮公所畫定的社區範圍內，社區就可能出現新的組織或勢力，申請登記為社區發展協會，出現新、舊組織的衝突，暴露社區畫定的問題。依研究者觀察，社區衝突的產生，可能只代表地方派系的權力之爭，不必然是社區參與的覺醒，但即使是地方派系之爭，在民主的規制下，派系亦須藉由居民認同方能取得合法正當性。長遠來看，也是社區組織運動發萌的開始。

因此，在社區政策上，本研究的第一個建議是，由民間與官方共同畫定社區範圍並減少對社區組織認定的限制，或至少應擴大社區範圍，允許社區自由組織不同名稱之團體參與社區事務。自社區發展工作綱要規定，社區內若有三十人發起，即可申請登記為社區發展協會，受人民團體組織法約束。然因發起人數過少，是否足以代表該社區居民；又可能引發之地方派系權力鬥爭造成組織轉型的困擾。是以本研究建議將目前只承認一個社區，一個發展協會的規定取消，使社區組織得到多元的自主空間和競爭機會，而更引動社區活動契機。也避免社區因範圍過小而資源不足以自助，社政單位因社區過多而兼顧不暇的

困境。

第二個建議，減少工作項目的規定，並鼓勵社區因地因時因需要，自行開創社區特色的發展。目前社區政策規定社區應斟酌辦理的有政府指定項目，年度推薦項目，社區自創項目等數十項工作內容。限於經費，大部分社區若無能得到政府補助，連以前的發展成果都難以維持。審視若干工作項目，實為地方基層建設的責任，應交還給政府，以減輕社區的負擔；否則社區做不來的硬要指定給社區，反落政府推卸責認的口實。重要的是，培養社區自創發展的能力，鼓勵自創項目，使供給面與需求面配合，避免每個社區將偌大的活動中心，掛著一成不變的招牌卻佈滿灰塵乏人問津。例如鼓勵社區以寺廟為中心，運用宗教信仰力量，舉辦特殊祭祀慶典、宗教民俗活動，不僅提供社區居民的休閒、文化功能，甚至形成觀光特色，增加社區收益等，如宜蘭頭城搶孤、台南鹽水烽炮等。

第三，加強社區組織和社區發展相關教育訓練。教育訓練的實施的對象應包括，各級社政主管機關行政人員、專業人員，社區組織工作幹部和最重要的，社區居民。尤其是對居民的宣導與教育，長久以來付之闕如。對社區組織的專業訓練過於保守，也是今日社區工作者力不從心的原因。社區幹部和居民認知社區發展是政府工作，只希望能勉強完成政府交辦的指定工作就好，即因教育訓練的不足，使社區經驗和理論脫節。要強調者，政府必須先有澄清社區發展本質的決心，並排除、控制民間組織力量的心態，方能從政策與教育訓練的雙效中成功。

第四個建議是，規畫全方位的社區發展工作模式，結合民間各類資源，建立社區生命共同體的典範。本研究建議社政單位與民政單位、教育單位、經濟單位和地方政府共同研擬規畫，根據社區不同的特質與需求，輔導該社區以寺廟、學校、農會、企業或鄉鎮公所等機構為中心，推展社區工作。例如有以學校為中心的文化性社區，也可有以寺廟為中心的民俗性社區，當然亦可有以農

會為中心之經濟性社區；則我國的社區發展工作將更落實於民間基層結構，與居民的生活經驗也將更緊密結合。

二、對獎勵宗教慈善政策的三個建議

Cochran, Clarke E. (1990) "Religion in Public and Private Life" 一書中指出，宗教看似私密性的，其實也是公眾的。例如一歇禱告和皈依儀式，有其公開的文化影響；雖然宗教所指涉的公私領域很難區分且常受爭議，也有宗教訓示其教徒遠離政治的統治者，但宗教不能也不應再局限於私領域中，應進而影響政治，甚至以宗教信仰去挑戰政治。

公益慈善本是宗教團體根據其教義，所表現出的一種對人和社會的關懷。要求或期待宗教團體參與更多的社會福利事業，其實就是要求宗教在公共領域或公共事務中扮演更積極或更重要的角色。但在臺灣的宗教政策中，政府當局一方面強調「宗教是個人的心靈寄託」，不希望宗教涉入政治或公眾事務；一方面又要求宗教積極提供資源參與像社會福利這樣典型的公共事務，其間的矛盾極為明顯。因此，天主教對社區發展有興趣，卻被當局以該項事務屬政治性與組織性而加以拒絕。（張隆順，1987）幾年前天主教外籍神父馬赫俊因積極投入勞工組織與運動，而遭當局驅逐出境。另有許多地方性社區祭祀活動，其實含有濃厚的社區互助或重分配意義，卻常被政府當局認為是一種鋪張浪費的消耗，並以種種方式要求社區減少祭祀花費，並定訂獎勵辦法令寺廟將收入用於公益慈善事業上（林本炫，1993:12-13）。

宗教慈善是否能替代建制化的社會福利制度迭有爭議，但志願部門作為一個補充性的角色卻游刃有餘。社區組織本是居民志願性的結合，其為一社會福利途徑乃毋庸置疑，是以政府應積極接納寺廟在社區中的角色，其根深於基盤結構中不可替代的力量。建議政府應將宗教政策和社會福利政策加以配合，使不同的宗教資源能發揮最大的福利效益和社會功能。例如「臺灣省加強社區文

化建設工作實施計畫」第四點主張「結合社區寺廟、宗教團體，共同推動文化活動……」即為一例，可惜的是沒有具體策略。

因此本研究第一個建議，對於寺廟參與公益慈善，不論監督管理，或獎勵興辦，都不宜只由單一部門研修制定，應盡量將寺廟的功能給予正面導向。例如社區發展和村廟的關係密切，卻很少看到相關的宣導或報告。顯示社區發展和民政系統仍有未銜接、不相熟之處。不僅中央單位的重大決策應聯繫配合，即在地方政府更應緊密合作，建立社區中有寺廟，寺廟外即社區的系統性資料。

第二個建議是，擴大獎勵項目，尤其有具體公益慈善事實者更應給與獎勵。舉例來說，除了捐獻金錢，寺廟可能可以提供人力物力資源，而這些效益是無法以金錢衡量的。尤其像社區中的村廟，不一定有雄厚的財力，卻可以就近支援社區發展，直接讓社區居民受益，其效率和大額捐款比起來，後者須再透過分配和輸送的過程並扣掉行政支出的消耗，不可謂不大。而村廟資源對社區發展來說，其實更具「可近性」、「適當性」和「立即性」。如此看來，村廟不也應受鼓勵嗎？

而第三個建議是，獎勵有很多方法，不一定只能用獎章或表揚。獎勵的方式除了現行由各級政府視宗教團體捐款多少，給予不同獎章獎狀外；也缺乏其他評估方法和獎勵方式使鼓勵更具實質意義。例如社區考核，也有頒發獎金的鼓勵方式。而宗教團體的獎勵因假設宗教團體經費很多，不須再予以援助；其實若不單以捐款額數為獎勵標準，就會發現，很多宗教團體投入公益不一定有充裕的經費，例如有些教會若沒有國外教會的支持，是很難支持的，而臺灣經濟奇蹟揚名於外，很多國外經費逐漸被削減或取消。又如村廟的香火也不一定就用不完。

此外，很多寺廟希望政府以減免寺廟稅捐的方法來鼓勵參與社區發展工作。顯示在實用主義的期待下，獎勵的方式似乎可以更實際、更具體、更多元和

更有彈性。在目前的寺廟租稅之徵免方面，凡持有寺廟登記證者免徵地價稅和房屋稅，然限於其宗教傳教佈道，祭祀崇拜之直接用地；或已向內政部登記立案，不以營利為目的之文化醫療公益慈善救濟事業，所直接供事業使用之用地或房屋免予徵稅。依法辦理寺廟登記之宗教團體尚可免徵遺產稅、贈與稅。其他如非供宗教直接用途之土地、房屋、或以私人名義為所有權登記者皆不適用免稅規定。其他尚有如土地增值稅、所得稅、營業稅等諸多繁瑣規定，（省政府民政廳，1993:223-236）寺廟若不熟諳，則時有逃漏稅或溢繳之虞。因此，將寺廟的免稅範圍擴大，並清楚執行認定標準，則對寺廟是一種鼓勵，對稅捐機關來說，也免去許多查稅的困擾。

總之，如何達到獎勵的目的使不徒具形式，或不使成為宗教團體獲取社會正當性或政治正當性的工具，都是目前獎勵政策應重新評估的方向。

從社區發展的擴散採借經驗到本土化紮根的路途十分漫長，而在時間上我們已經落後了許多。為了不使既存的發展成果隨時代變遷而褪色煙沒，也為了不使未來的革新途徑因循困頓於過去的老路；本土化的研究工作顯得關鍵而重要。這個開發傳統宗教資源以利於社區發展需求的研究將只是一個拋磚引玉的嘗試，用以期待更多關注臺灣社會工作本土化的投入。

參考書目

1. 內政部統計處（1993a），中華民國八十一年臺灣地區社區建設與活動調查報告。
2. 內政部統計處（1993b），中華民國八十一年臺灣地區宗教團體調查報告。
3. 中華民國社區發展研究訓練中心、台灣大學社會學系（1987），宗教與社會福利研討會實錄，社區發展季刊，38, 70-77。

4. 汲宇荷（1990）我國現階段社區發展過程中政府角色之研究，台北：中華民國社區發展研究訓練中心。

5. 林本炫（1993），宗教與社會福利，台北：民間社會福利研討會論文。

6. 林美容（1993），台灣人的社會與信仰，台北市：自立晚報文化出版部。

7. 徐震（1983），台灣省十年來社區發展成效之評鑑及未來發展之研究，南投：台灣省政府研考會。

8. 徐震（1991），台灣社會轉型中，社區發展的新模式與新作法，社會福利月刊，94, 11-18。

9. 許雅惠（1994），在鄉村社區發展過程中傳統宗教的角色與功能，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10. 黃維憲（1990），變遷中台省寺廟的社會福利服務，台北：五南出版社。

11. 臺灣省民政府（1993），寺廟負責人研習聯誼活動課程教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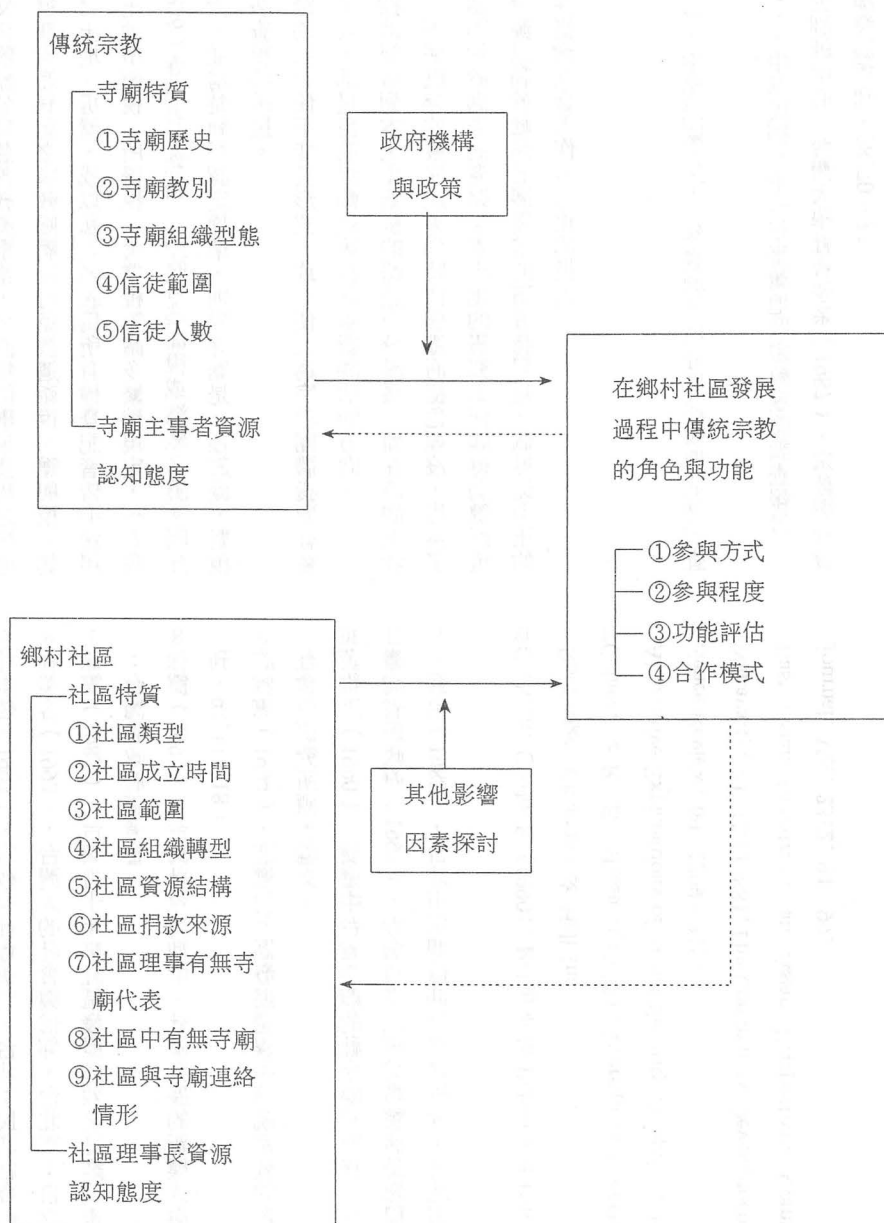
12. 鄭興弟（1983），台北市民間信仰行為之研究，台北市政府研究考核委員會。

13. Cochran, Clarke E. (1990), Religion in Public and Private Life, New York: Routledge, Chapman & Hall Inc.

14. Collier, & R. E. Messick (1975), Prerequisites Versus Diffusion: Testing Alternative Explanations of Social Security Adop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9, 1299-315.

15. Nanavatty, M. C. (1988), The Community Development Movement in South East Asian Countries: an Asian Perspective, Community Development Journal, Vol, 23:2, 94-99.

圖一 研究架構



表一 寺廟參與社區發展工作之方式與程度 (N=108)

	經 常	偶 而	從 未
捐土地建活動中心	31 (28.7)	0 (0.0)	77 (71.3)
出借場地器材	25 (23.1)	24 (22.2)	59 (54.6)
捐獻金錢	10 (9.3)	27 (25.0)	71 (65.7)
發動信徒、人力	21 (19.4)	31 (28.7)	56 (51.9)
協助規畫	15 (13.9)	25 (23.1)	68 (63.0)
宣傳廣告	8 (7.4)	29 (26.9)	71 (65.7)
提供辦公室	16 (14.8)	31 (28.7)	61 (56.5)

表二 寺廟參與社區發展程度與社區特質之差異分析

檢定變項	是否參與		參與程度	
	X ²	sign.	X ²	sign.
社區座落	3.53	0.4734	2.93	0.5692
社區類型	10.91	0.0121*	4.09	0.2522
社區歷史	5.66	0.2264	1.92	0.7513
社區範圍	1.36	0.5062	0.90	0.6388
社區組織轉型	0.28	0.8673	3.17	0.2052
寺廟之有無	7.77	0.0053**	3.42	0.0645*
寺廟是否捐款	3.92	0.0478*	0.03	0.8567
寺廟任社區代表	7.72	0.0055**	6.18	0.0129*
連絡情形	32.26	0.0000***	21.94	0.0000***
合作情形	24.65	0.0000***	23.00	0.0000***

+p<0.10 *p<0.05 **p<0.01 ***p<0.001

表三一1 社區理事長認為傳統宗教本質、寺廟參與社區發展最大的困難和最重要的工作是…… (N=76)

最大的困難		最重要工作		傳統宗教本質	
政府不鼓勵	44.7%	政府政策鼓勵	50.0%	值得發揚光大	52.6%
不知如何進行	21.1%	理事會主動連絡	19.7%	有利社會人心	5.8%
寺廟根本無法幫忙	11.8%	社工員推動	15.8%	不太了解	3.9%
其他因素	10.5%	寺廟代表任理事	11.8%	人為因素不良	19.7%
不了解寺廟	6.6%	沒有回答	2.6%	迷信陋俗	2.6%
沒有回答	5.3%			未答	5.3%
總計	100.0%	總計	100.0%	總計	100.0%

表三一2 寺廟主持人認為寺廟參與社區發展最大的困難和最大的功能是…… (N=76)

最大的困難		最大的功能		最好的鼓勵政策	
與宗教理念不合	22.5%	吸引更多信徒	2.5%	減免寺廟稅捐	40.0%
獨立自主性受影響	17.5%	表示香火鼎盛	7.5%	表揚頒獎章	25.0%
寺廟不知如何配合	37.5%	回饋地方繁榮	20.0%	頒發獎金	15.0%
社區理事反對	2.5%	弘揚宗教濟世精神	22.5%	不必特別措施	17.5%
其他	10.0%	促進社區團結	12.5%	其他	0.0%
沒有回答	10.0%	以上皆有	35.0%	未答	2.5%
總計	100.0%	總計	100.0%	總計	100.0%